

以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

吴启钱

以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要求。这是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良好环境的重要措施。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只有公平竞争才能优胜劣汰、提高生产效率、落实创新驱动、促进科技向善、切实保护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利益。但公平竞争不可能在纯粹的市场环境下自动获得，必须依靠政府监管。因为每个市场主体会以其“经济人理性”，追求自身利益（利润）最大化，就可能使用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就可能出现资本无序扩张，形成垄断，进而损害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利益，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必须通过监管这种政府“有形之手”，来及时矫正。这是世界各国特别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

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对平台经济、医药、公用事业、建材、汽车等民生发展重点领域的监管，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了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各类不公平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仍然量大面广，市场中存在的虚假宣传、商业诋毁、商业贿赂和资本野蛮生长等问题，仍然严重危害着公平竞争环境。同时，政府监管工作中也存在着不作为、乱作为、厚此薄彼等不公平问题，甚至存在以监管为名“寻租收租”、乱罚滥罚问题，既影响了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的效能，更损害了政府形象。

所以，必须以公正监管来保障公平竞争。

公正监管，首先要求监管部门依法履职。法治社会对政府的基本要求是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体现在监管上，就要坚决做到对违法者依法严惩、对守法者无事不扰。为此，一不能对市场主体不合法不合规的行为放任不管，该约谈警示的应该约谈警示，该处罚的要处罚，让法律规定通过监管长出“牙齿”，规范市场竞争。二不能没有法律依据而随意检查、随意处罚，尤其是不能随意“叫停”和取缔竞争中的创新行为。创新是市场主体赢得市场竞争的根本法宝，但由于法律的滞后，不是所有的创新行为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就应该被保护，至少应该被容忍；如果没有法律依据，即便某些竞争行为对公平竞争造成了负面影响，也只能先完善法律再去矫治，而不能以监管的名义加以扼杀。三不能以监管的名义任性执法、逐利执法和运动式执法，与民争利、扰民渔利。前不久，国务院督查室通报的河北省霸州市大规模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就是典型的违法行政，典型的不公正监管。这种“没错也罚你没商量”的做法，严重侵害了中小微企业的切身利益，严重破坏了当地营商环境，性质十分恶劣。

公正监管，要求监管部门对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的违法行为“同案同判”，不能畸重畸轻，更不能办人情案，滥用职权以谋私利。有关部门应该依据《行政处罚法》及时清理规范行政处罚事项，对标准不一等问题及时作出调整。同时，可借鉴人民法院推进“同案同判”的做法，建立行政监管尤其是行政处罚“指导性案例”发布制度、“类案检索”制度和处罚文书网上公开制度等，以进一步解决行政监管中法律适用不统一、裁量权行使不规范的问题，以监管的确定性给市场主体更稳定的预期。

公正监管，要求监管部门对各类

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在我国，所有的市场主体，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个体户，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都为国家创造税收、为社会创造就业、为投资人创造利益，应该受到公平对待。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行为一定有选择，比如金融机构给谁贷款不给谁贷款，利率是不是优惠等，是其可以自由行使的民事权利。但政府的监管（和服务）行为则没有也不能选择，必须一碗水端平，确保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从制度上保障各类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底气、韧性所在。在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情况下，通过公正监管，鼓励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就能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促进经济稳中求进提供有力支撑。



给算法套牢“紧箍”才能保护公民权益

冯海宁

近日，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自3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健康发展（1月4日央视网）。

算法推荐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广泛应用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对平台而言，可以节省成本、提升效率，为用户精准推送个性化内容；对用户来说，可以节省时间、精力，快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过，算法推荐暴露的问题也不少，比如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诱导沉迷等不合理应用导致

的问题，给公民权益、社会秩序、互联网生态等造成伤害。

此前，《数据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等，已经对算法推荐作了相关规定，对市场起到了规范作用。但时至今日，算法推荐存在的问题依然较多，且广泛存在，引发公众反感 and 不安。网上已出现用“不登录、不点赞、不关注、不评论”等方式减少留痕、反算法的潮流。

但民间反算法的作用极其有限，只能通过完善制度、加强监管给算法套牢“紧箍”。该《规定》就是进一步完善算法管理体系的重大制度安排，虽然权威性不及国家法律，却是上述法律的必要延伸和重要补充，是规范算法的唯一专门制度。

从对公民合法权益保护来看，《规定》契合民意诉求。众所周知，算法被一些人称为精准“算计”，原因就在于，很多用户在不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推荐个性化内容，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能使用被推荐的内容，那么，公民的知情权、选择权乃至公平交易权就会被侵害。对此，《规定》明确保障算法知情权、保障算法选择权，只要主动权在公民，就能避免被侵害。

而且，算法还成了一些平台诱导孩子沉迷网络、“绑架”老年人、压榨劳动者的利器。比如，不少老人陷入“数字沉迷”，外卖员遭遇“最严算法”等，都与算法有关系。《规定》提出不同要求：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应当便利老年人安全使用算法推荐服务；应当建立完善平台订单分配、报酬构成及支付、工

作时间、奖惩等相关算法。

就《规定》而言，是很有针对性，但任何规定只有发挥作用才有意义。《规定》能否不打折扣落地，让人有些担忧。比如，《规定》要求应当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便捷地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其实《电子商务法》等早有类似规定，但很多平台并没有落实。

要想让这种“紧箍”对算法推荐发挥应有的约束作用，还需要尽责的“念咒人”。所谓“念咒人”，首先是有关监管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严格落实《规定》和相关法律要求，对违规平台严格依法处置。其次是公众和受害人，对算法侵权行为要勇于举报、起诉。另外，舆论监督、消协组织、行业组织也应发挥各自作用，对违法违规的算法推荐，大声说“不”。

上海“元旦宝宝”仅7个？用更多数据公开安抚生育焦虑

江德斌

1月3日，微博用户“@了不起的兵马俑”发布消息，称上海“出生率降低到可以一展示了”。依据是“今年元旦上海新生儿数量跌进个位数7个”。为了形容生育状况之严峻，他还将这一数据与网传的一组数据进行了对比，得出“继去年元旦27个之后再度缩水将近4倍，相较1990年元旦2784个缩水将近397倍”的结论。上海辟谣平台记者核查发现，以上数据均与事实不符（1月4日上观新闻）。

从该微博发布的消息看，他的数据源于“上海发布”元旦期间发

布的《新年第一批沪宝宝出生啦》的短视频，由于审题不仔细，误将“首批”数量等同于“一整天”出生的数量，才会得出这个错误结论。事实上，仅上海第一妇婴医院截至1月1日早上8时就出生了11个宝宝，如果算上其他医院，那全上海“元旦宝宝”数量绝对不止这个数，可见“今年上海‘元旦宝宝’仅为7个”确属谣言。

而且，据上海辟谣平台记者核查发现，网上所传播的上海历年“元旦宝宝”出生数量，即“今年元旦仅生育7个”，还是“去年元旦的27个”“1990年元旦的2784个”，其数据均不符合实，大都是网友通过“随申办”查询结果。这些

数据缺乏权威性来源，且以讹传讹，被部分自媒体夸大其词，过于夸大“上海出生人数减少”趋势，用以分析人口出生率剧烈下滑，有意渲染社会大众的焦虑情绪，借此来博眼球引流。

而且，此种信口开河、故意放大生育焦虑的谣言，近年来在网络上反复出现，不断被各种自媒体引用，甚至被一些名人、学者、机构当成研讨生育政策的数据。显然，从这种不靠谱的数据来推导，必然会谬以千里。因此，需要公开“元旦宝宝”的真实数据，用真相来回击谣言，安抚生育焦虑情绪。

近年来，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总量均

呈现下降趋势，社会上关于人口拐点、负增长、鼓励生育等话题讨论颇多，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群体性的生育焦虑。上海作为拥有约2500万人口的大城市，亦面临出生率下滑、老龄化加速等社会问题，且上海市的生育情况具有风向标意义，大家对“元旦宝宝”数量的热烈关注，也是在替上海生育情况担忧，希望能够出台扭转人口下降的有效措施。

元旦宝宝数量多少、历年变化，折射出人们的生育欲望，背后则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人口问题非小事，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发展，而生育政策的调整，则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人口数据并非机密，各地每年都要统计、公开，由此制定公共政策，供企业单位、社会大众作为研判发展、制定计划的依据。因此，面对民众所关切的“元旦宝宝”等数据，相关部门在发布人口数据时，也可以更加细致、多元，以进一步契合社会大众的需求。

干好“千头万绪的事”为的是“千家万户的事”

刘越祥

“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所说的一句话。

“千头万绪的事”，说的是繁忙的工作；“千家万户的事”，讲的是百姓的事儿。把“千头万绪的事”与“千家万户的事”画上等号，既饱含着“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为民情怀，更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所有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放到为民服务上。

基层党员干部长期与群众面对面，经常“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甚至“白加黑、五加二”地工作，对这句话的理解应该更直接。或许，有些机关同志认为，他们平时工作也是“千头万绪”，比如理论学习、起草文稿、建立台账等，与服务“千家万户的事”似乎对不上号。其实，这些工作与做好“千家万户的事”有着必然联系。

应当讲，无论是基层还是机关，党员干部干的“千头万绪的事”，大都是为了服务“千家万户的事”。但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所干的“千头万绪的事”，未必就是“千家万户的事”。

比如，有的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评比、考核，为留痕而留痕，做了不少敷衍上级的“差事”；有的工作上“扎扎实实搞形式、轰轰烈烈走过场”，做了不少表面文章的“虚事”；有的面对群众诉求，干一些套路积极，背后虚与委蛇，干了一些糊弄群众的“假事”；有的面对矛盾困难，各自为政，推诿扯皮，做了一些争执不休的“破事”；有的不顾大局，不讲团结，

明争暗斗，相互拆台，干了一些内耗严重的“蠢事”；有的上班期间，利用手机炒股、玩网游、看小说、搞社交，忙了一些顺手牵羊、不务正业的“私事”；有的忙于应酬接待，善于迎来送往，做了不少溜须拍马的“屁事”；更有甚者，把公权当私器，利用手中职权，挖空心思，大搞权钱、权色交易，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坏事”。

不该有的“千头万绪的事”，可能还有不少。这么做的人，不是为了千家万户的事，而是为了小团体的事或者个人的事，这不是真干事，也不是在干真事。“千头万绪的事”真不真、实不实，都是通过“千家万户的事”行不行、好不好来体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群众最有发言权。

比如，疫情防控、教育“双减”、数字化改革、老旧小区改造等，都是“千头万绪的事”，也是“千家万户的事”，因为暖人心、得民意，做到了群众的心坎里，“千家万户”就为之点赞。可见，只有把“千家万户的事”做好了，“千头万绪的事”才算干到了点子上，群众才会认可。如若违背或偏离了“千家万户的事”，“千头万绪的事”干得越多，群众就越唾弃、越反对。

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初心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都在为民服务上。“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集中体现了党的宗旨和初心。这也昭示我们，不论是干“千头万绪的事”，还是“千思万虑的事”，抑或“千辛万苦的事”，目标只有一个：办好“千家万户的事”。

全民健身周,让我们动起来

徐 川

新年到了，全民健身周来了。去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宁波市全民健身条例》规定：每年一月第一周为我市全民健身周。尽管受疫情影响，大规模赛事活动受到一定影响，但我市各级体育部门仍积极创新方式，在这个全民健身周精心组织了一系列群众性体育赛事以及展演展示、培训讲座等活动，给广大市民准备了全民健身的“饕餮盛宴”。其中，已延续39年的迎新年群众健康跑活动也将以线上方式举行，目前报名参与人员踊跃。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健身对于促进人的健康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据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在影响健康和寿命的七大因素中，体育运动占17%，仅次于心理健康因素而居第二位。

尽管近些年我国居民的期望寿命逐年有所提高，但体质和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据中国保健学会对我国16个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居民抽样调查显示，亚健康人群超过70%。另据近日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发布的《第五次国

民体质监测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成年人超重率、肥胖率分别为35.0%和14.6%，较2014年分别增长了2.3个百分点和4.1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运动的缺乏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应当让运动健身真正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为此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切实转变观念，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要学会从繁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尤其要避免沉湎于酒局牌局、手机电脑，到运动场和大自然中去挥洒汗水，释放激情，享受快乐。

同时也需要政府有所作为。除了加大体育健身场地设施的供给，努力破解“健身去哪儿”的难题外，还要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营造更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激发更多人的健身热情，动员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全民健身的行列中来。全民健身周设立的意义就在于此。

让我们积极响应，以运动的方式和全新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年到来。让运动伴随我们一整年，乃至整个生命。

企业发红包留职工过年是一种多赢

叶金福

日前，浙江省宁波市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项乐宏向全体员工发出一封公开信，倡议留岗员工响应政府疫情防控号召，一起留在宁波过年。为此，今年乐歌公司计划投入600余万元鼓励职工留甬过年（1月4日《浙江工人日报》）。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眼下，元旦已过，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许多在外务工的人已经开始准备回家过年。

然而，由于国内还有一些地方的疫情依然严峻复杂，许多人今年回家过年的路途似乎不那么顺畅。加之，春运期间，人员来来往往，人流量特大，这更是给疫情防控增添变数。

在此背景下，乐歌公司通过发红包留职工过年，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既体现了企业的防疫意识，又体现了企业视职工生命健康安全至上的理念，更体现了对职工的温情和关爱。

一方面，发红包留职工过年，是眼下“防疫之需”和“安全之

需”。近段时间以来，各地零星疫情时有发生，加之境外输入病例从未间断，可以说，“内防反弹，外防输入”依然是当前防疫重中之重。正是基于防疫及安全的双重考虑，一些企业开始发红包留职工过年，既是现实需要，也体现了企业的担当精神。

另一方面，发红包留职工过年，彰显了企业留人的真心实意。近年来，每到春节过后，用工荒就成了企业的一大难题。而发红包留职工过年，不但能留住职工的“人”，更能留住职工的“心”。对于企业来说，可以有效破解“用工荒”，实现企业年前年后都能平稳生产；对于职工而言，有了“过年红包”，既多了物质上的保障，又有了精神上的慰藉。

当然，除了发红包，企业还需为留下来过年的职工提供舒心、舒适的安排和服务，切忌“一发了之”，不管不问。比如：组织职工一起吃年夜饭、一起看联欢晚会、一起搞联欢活动，一起包饺子，等等，让留下来过年的职工也能感受到浓郁的过年味道。